養。我從教授那裡得到的一針見血的建議，同時也讓我參與很多雄心勃勃的計畫，為我對原住民的長期研究奠定了基礎。我希望能夠在教授建立的基礎下，扶翼下一代來報答教授的恩情。

我謹對末成教授的去世再次表示誠摯的哀悼，並對他所提供的一切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謝。

註釋：

1. 末成道男編，《中國文化人類學文獻解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5。
2. 日本順益臺灣原住民研究會編，《臺灣原住民研究概覽——日本からの視點》。東京：風響社，2001。
3. 《ベトナム文化人類学文献解題——日本からの視点》。東京：風響社，2009。
4. 末成道男，《台湾アミ族の社会組織と変化ムコ入り婚からヨメ入り婚へ》。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3。
5. 末成道男原著，羅素玟主編，何姵儀、黃淑芬編譯，《臺灣阿美族之社會組織及其變化：從招贅婚到嫁娶婚》，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7。
6. 末成道男，《台湾アミ族の社会組織と変化ムコ入り婚からヨメ入り婚へ》。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3，頁302。
7. 黃貴潮、馬淵悟，〈《台湾アミ族の社会組織と変化》への反論〉，《民族學研究》，50巻，1号(1985)，頁81-89。
8. 山路勝彥，〈台湾アミ族の性差と母の力〉，頁10，《社会学部紀要》，卷111(2011)，頁9-23。
9. 船曳建夫，〈末成道男著，《台湾アミ族の社会組織と変化：ムコ入り婚からヨメ入り婚へ》〉。《民族學研究》。卷49-1(1984)，頁84-85。
10. Rodney Needham, “Remarks on the Analysis of Kinship and Marriage.” In R. Needham ed., *Rethinking Kinship and Marriage*. pp.1-33. London; New York: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71; David M. Schneider, “What is Kinship All about?” In Priscilla Reining ed., *Kinship Studies in the Morgan Centennial Year*. pp. 88-112. Washington, DC: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Washington, 1972.
11. David M. Schneider, *A Critique of the Study of Kinship*. Ann Arbor, Mich.: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4.

末成道男教授在越南人類學研究的成就

宮沢千尋（日本南山大學）
（蔡志祥譯）

一、前言

末成道男教授是一位傑出的文化人類學家。他在日本、沖繩、台灣、韓國和中國等東亞地區的細緻的田野調查及成果，得到學界廣泛的認可。大抵，在末成教授的研究生涯中，越南領域的研究起步較晚。從1992年直至辭世這段期間，雖然末成教授仍然繼續台灣及中國的研究，但是，他出版了很多和越南有關的、主題廣泛的書籍和論文。作為末成教授在越南人類學研究領域的第一位指導學生，我認爲他有在日本建立越南人類學研究的使命感，他熱愛這個領域並且享受在越南的調查研究。下文將簡介末成教授的越南人類學的成就以及他的越南人類學研究的特徵和貢獻。

二、末成教授的越南人類學的研究主題

從廣義上講，末成教授的研究對象是家庭、親族、祖先祭祀、村落社會和和宗教等方面。在

家庭、親屬關係和村落社會的研究方面，末成教授結合了村落的田野調查與口述歷史以及河內的漢喃研究院藏的文獻資料，將歷史和越南地域研究高度整合。可以說，他從一開始就抱持著一種試圖利用歷史文獻資料，從長期的視野來了解越南社會。然而，他並沒有過度偏重文獻資料。反之，田野調查是末成教授的研究重心。

1998年出版的《ベトナムの祖先祭祀――潮曲の社会生活》（《越南的祖先祭祀：潮曲的社會生活》，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出版。該書內容和風響社版相同）討論越南北部紅河三角洲的一個村莊――潮曲社――的社會生活。本書不僅探討社會結構如何規範祖先祭祀的行爲，讀者並且可以從田野工作者如何試圖以整體的角度瞭解地域社會生活的面向窺見末成教授的研究風格。該書除了在「村莊組織」、「村莊的歲時節令」、「村莊的家庭」、「村莊的親族」以及「生命儀禮」等章節中詳細描述了潮曲社的社會生活外，在「村莊的歷史」一章中，從政治和經濟的角度描述了1986年新政開始之前的社會生活。在1990年代越南的政治局勢下，外國人很難對當前的政治和經濟問題進行研究，末成教授也不例外，同樣遇到被拒絕訪談的時候。即使如此，末成教授也堅持的認爲：「對人們的生活來說，政治、經濟及其歷史與民俗和文化同樣重要，也因此與民俗和文化密切相關。無視政治、經濟和歷史的抽象的描述和研究，不僅對當地人毫無意義，也不是筆者所關懷的。」[1]

該書的其中一個特色是包含了很多和在地調查訪問相關的插圖，如實地反映了教授慎密的、深度的調查研究。例如，在第五章「村莊的家庭」，在討論居住在同一居所的成員的系譜時，以房屋的平面圖進一步顯示他們之間的關係。在第六章「村莊的親族」中，用譜系圖來說明喪禮的參加者的關係，並且以插圖來表明喪禮後宴會的座位安排和親族關係。末成教授指出「將一個社會的各種相關元素整合的綜合性專著已經不再流行。人類學目前的關心傾向於質疑描述的內容及其資料的根據。我恐怕這樣的發展趨勢，會令到人類學最重要的觀察和描述社會文化的基本工作會被忽視。」[2]

此外，末成教授的田野調查點涵蓋了越南北部、中部和南部。從民族的角度來看，他的研究對象並不局限於越族。雖然他自己沒有出版什麼關於越南其他民族的研究，但在他的指導和支持下有樫永真佐夫關於黑泰傣族的研究、中西裕二關於華人和高棉人的研究、新江利彥與本多守關於越南中部高原少數民族的研究。他與越南文化研究院（原名民間文化研究院）的周春交（Chu Xuân Giao）氏調查訪問和越族有關係密切的、在南中國生活的客家語系的「艾」族（Ngái）。

三、與東亞其他地區的比較及重新思考各地域文化的視野

如上所述，末成教授的越南人類學研究，是建基於其豐富的東亞田野調查經驗。教授認爲從越南文化和習俗的細節中，可以找到東亞地域共同的文化元素。

末成教授強調東亞人類學研究的比較視野，並經常使用「越南之鏡」一詞。教授指出，越南兼具東亞和東南亞的特點，其社會文化極具多樣性。因此，觀察者假如從自身所屬的社會文化出發，就可以很容易的注意到這些不同的特徵。[3] 例如：從河內的氣候和水田的田園風光、木魚和唸佛的聲音、味噌、豆腐、白餅等風物景象，日本人很容易從越南聯想到日本，從而認爲雖然儒家思想在越南的滲透力超越日本，可以媲美韓國，然而他們鍾情的、生活的素質卻與日本接近。教授認爲研究越南有趣之處在於縱使文化類似，然而比較韓國、中國、東南亞各國、歐美、以至俄羅斯等地域的文化的話，就不難從雷同中發現差異。例如，漢族人類學家對越南也有家譜記錄而感到有一種親切感，然而很快就會意識到越南家譜的書寫方式和中國的世代原則不同。[4] 此外，在教授參與的日、韓研究人員對韓國和日本社會組織進行的比較研究中，他發現透過使用「越南之鏡」的方法，「可以同時看到事物的實象和虛象。」[5] 教授指出「日本和韓國的繼嗣群體和村落的關係，家族的團體性和關係性，年齡組織中的場域，以及親族組織的歷史和變化等還沒有充

分理解的問題，大概可以透過比較的方法而解明。」[6]

四、促進東亞人類學研究交流，將研究成果回饋當地以及培育本土人類學家

末成教授的身邊除了日本人外，總是有許多渴望研究亞洲人類學的留學生。他們不論國籍、種族或隸屬的大學，都會在教授開設的課程和組織的研討會交流學習。

教授熱衷促進東亞人類學的研究交流。越南人類學研究方面的相關成果包括在「周辺から見た中国の変動過程に関する人類学的研究」（「從周邊看中國變遷過程的人類學研究」）國際學術會議中組織的「東アジアの変動過程の人類学的研究——中国文明とその周辺」（「東亞變遷過程的人類學研究——中國文明及其周邊」）的專題小組。這小組的成果，出版在教授編輯的《東アジアの現在——人類学的研究の試み》（《當代的東亞：人類學研究的嘗試》）。[7] 一般來說，國際學術會議都是以英語（或一種語言）作爲官方語言。然而，這樣的話，時常會造成母語者和非母語者之間表達能力的差距，從而難以進行對等的討論。因此，在這個專題小組以及後來出版的成果，所有的研究報告都被翻譯成報告者的母語如日文、英文、中文、韓文和越南文等。末成教授强調研究討論的對等性，特別是在如人類學等涉及「他文化的翻譯」的學術領域，更爲重要。這是一個關係到研究本質的問題。因此，在翻譯成各種語言時要注意避免「忽略少數群體」的偏見。[8]

另一方面，教授也著重將研究成果回饋當地社區。2002-05年間，末成教授獲得科學研究資助金，進行「ベトナムに関する日本文化人類学研究の総括と現地への発信」（《日本文化人類學關於越南研究的綜論及其在當地的傳播》）（基礎研究（B），2002-2005）研究計劃，並於2006年發表同名的報告。[9] 本書概述了日本、越南和西方國家關於越南的文化人類學及相關領域的研究動態，並且對主要的研究成果解題説明。值得注意的是，該報告被翻譯成越南語，使得在日本以外鮮為人知的日文研究成果，得以回饋越南。2009年，教授將該報告的日文部分補充和修正後，在風響社出版。[10] 同樣的，如下文所述，教授在多媒體和影像人類學方面的關懷，也回饋當地社會。

在教育方面，無論是否他指導學生，末成教授均致力於培養那些渴望從事人類學的本土人類學家。例如上文提到的越南文化研究院的周春交老師以及雖然不是人類學家，將《日本靈異記》翻譯成越南文並加以解説的阮氏鶯老師（河內漢喃研究院）等，都是師從末成教授。

五、在日本建立越南人類學研究組織

自1992年起，末成教授推動成立「越南社會文化研究會」。研究會每周一次，在他的工作單位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舉辦活動。活動主要是閱讀和報告文獻資料以及越南研究者的論著。文獻資料方面包括末成教授在越南研究期間收集的家譜、記錄村莊的概況和歷史的「社誌」等漢字文獻。研究者論著方面，我們閱讀了研究越南著名的美國歷史學家Alexander Woodside撰寫的*Vietnam and the Chinese Model*、法國殖民時期居住在越南的Leópold Cadière神父撰寫的關於越南歷史文化與研究樹木崇拜和喪禮的論文、以及Phan Kế Bính在1915年出版關於越南風俗的*Việt Nam Phong Tục*。[11] 當時負責解讀漢文文獻的有研究中國法制史，在東洋文化研究所擔任助理研究員的川村康教授、研究中國文學的笠井直美教授、研究中國史的黨武彥教授以及在東洋英和女學院大學的中國文化人類學家横山廣子教授。在學習院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科的武內房司教授則指導我們閱讀法文的文獻。曾經在河內大學留學並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專門研究越南北部村莊的Shawn Malarney教授在剛被國際基督教大學聘任時，也曾在這個研究會報告。研究會聚集了很多有志研究越南的研究生。

越南社會文化研究會的成員的調查研究計劃包括横濱市立大學研究醫療人類學的板垣明美教授。板垣的《越南文化與社會變遷中的傳統醫療保健的醫學人類學研究》（1995-1997）研究計

劃得到豐田財團基金會的資助，其研究成果包括2008年出版的《ヴェトナム——変化する医療と儀礼》（《越南：變遷中的醫療與儀禮》）[12]。此外，末成教授負責的「人類学から見たベトナム社会の基礎的研究——社会構造と社会変動の理論的研究」（「人類學視角下的越南社會的基礎研究——社會結構與社會變動理論的研究」）計劃得到日本文部省科學研究費的資助（1994-95），並在1996年出版同名的報告。[13] 除了上述的橫山、武內和板垣教授外，該計劃的研究員還包括研究韓國人類學的嶋陸奥彥教授、研究中國人類學的瀨川昌久教授、緬甸人類學的田村克己教授等。計劃的參加者包括研究中國史的片山剛和菊池秀明教授、研究台灣人類學的王崧興教授、研究越南歷史的嶋尾稔教授，研究越南中部高原的少數民族的中田友子教授，以及後來參加的研究黑傣族的世界有名的樫永真佐夫教授。這項科學研究補助費資助的計劃的成果，在1996年由末成教授主編，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出版的《東洋文化》第78期上發表了題為「ベトナムの人類学的研究」（〈越南的人類學研究〉）的專號。[14]

這項科研的計劃能夠聚集不同地域和領域的研究者，首先大抵是與末成教授的宏觀的比較視野和信念有關。從超越地域和學科界綫來認識地域社會，大抵也是末成教授提出的「越南之鏡」的有趣之處。其次，是與1990年代開始越南重新開放，讓研究者可以在封閉已久的村落進行田野調查，而研究者最早的調查切入點是歷史學。末成教授認爲：「不僅是人類學，歷史學等各個領域的研究都具有相輔相成的作用，尤其是在現在這樣急劇變化的時代，透過合作進行全面的理解至關重要。」。[15] 因此，能夠超越地域和學科界綫的研究計劃，是和末成教授的學養、個性和視野有關。

從1999到2018年，風響社出版了8期由末成教授主編，「越南社會文化研究會」的「會刊」《ベトナムの社会と文化》（《越南社會文化》）。末成教授指出會刊的出版經費除了由會員慷慨贊助外，還有來自1995年突然去世的王崧興教授的夫人的捐贈。王教授對中華文明與周邊地區的關係有著濃厚的興趣，他常向我提示越南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案例。1995年夏天，就在王教授仙游之前，他表示希望花兩週時間，調查研究在越南北部的「明鄉」華人的村落以及南部胡志明市的唐人街「堤岸」的華人社會。[16] 為日本越南人類學貢獻良多的《越南社會文化》的出版，實在有賴王教授對越南人類學研究的熱情以及末成教授和王教授之間的研究志向和友誼。謹向王教授表達最深切的謝意。

如上所述，末成教授為日本越南人類學研究奠定了扎實的基礎。

六、多媒體民族誌

1980年代，末成教授就開始用視像來記錄在海外的田野調查。上述《越南的祖先祭祀：潮曲的社會生活》一書，附有一張光碟，內有在潮曲舉行的祭祀儀式和手工藝的影片。最初的構想是讓影像和文本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不僅將光碟與文本連結，還計劃以多語言的方式展現。但這構思由於技術和時間原因而未能實現。教授表示，透過這種「多媒體民族誌」回饋當地的意義在於讓當地民眾更切身感受到研究的意義以及積極參與研究的可能性。教授希望電腦能夠在鄉村普及，而電影能夠在小學等地方放映。[17] 末成教授經常在課堂上向日本大學生和研究生展示他的實地考察時拍攝的影片。我印象很深的是末成教授放映的一段在台灣的喪禮時，道士在祭壇前進行的目連戲和破地獄的儀式的錄像。教授時常在課堂上播放他在越南田野調查時拍攝的錄像。

1990年代中期，我陪同教授去越南考察時，觀察到他的攝影風格就是不停地開著錄像機，就像寫「日記」一樣，不停的記錄一切。令人難忘的是，每天早上，在前往調查點時，坐在車上的副駕駛座上的教授，不停的拍攝車窗外的風景。即使在田野當地，他並不會停留在一個地方，而是不斷地移動，記錄許許多多的人、物和事。教授的方法是在拍攝結束後，將錄像展示給當地人和他指導的學生，問他們「這是什麼？有什麼意義？」雖然有時我覺得不應該在儀式現場太過接近拍攝對象，然而，似乎當地人是接受了老師的

攝影風格。

末成教授在東亞各地田野調查時拍攝的影片，目前在東京的東洋文庫搜索閱覽。（https://www.toyo-bunko.org/movie/suenari/indexEastAsiaMovie.html#vietnam）

七、對末成教授田野調查的一些回憶

筆者最初以翻譯的身份，陪同末成教授在越南進行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末成教授在東亞各地有著豐富的田野調查經驗，具有強烈的求知慾。在田野調查時，他關注的課題非常廣泛，而且在訪談時連珠炮發。因此，開始時總覺得翻譯很困難，然而也從教授那裏學到很多關於越南文化和社會的知識以及田野調查的方法。一般來說，資料提供人不一定是知識分子，不一定習慣向外國人解釋他們習以為常的習俗。在我忙著聆聽越南語並把它翻譯成日語時，沒有什麼時間注意訪談的上文下理或觀察周圍的情況。有時我覺得資料提供人的回答有點矛盾，向教授反映時，教授總是用一貫溫厚而清晰的語調說：「跟著呢……」，並根據自己在東亞各地的田野經驗，用一些例子來告訴我資料提供人的說法既並不矛盾，也不奇怪。

陪伴末成教授進行田野調查研究是非常開心的事。然而，在擔任翻譯期間，有一件事情讓我印象深刻。那是在調查結束後，我們經常會宴請幫助我們的村民、幹部、縣政府、以及在越南的對口研究機構，表示感謝和告別。這時，老師即興吟誦了一首日本俳句，讓在場擔任翻譯的我感到束手無措。這件事，後來時常成為了和擔任末成教授翻譯的前日本研究生們聊天談論時的話題。

八、關於末成教授的研究和理論的繼承與發展

如上所述，末成教授為日本越南人類學研究的發展以及越南本土人類學家的培養做出了巨大貢獻。他的研究成果被有志研究越南的日本年輕一代繼承和發展。他們包括一些末成教授在世時並不直接認識的人。

2024年11月9日日本越南研究會和「百越之会」在京都產業大學共同舉辦「日本越南研究者會議」。上午的獨立研究報告結束後，在下午舉辦了「末成道男教授追思」專題小組。本稿是以當時筆者回顧末成教授在越南人類學研究的成果的報告為基礎。報告時筆者放映了末成教授實地拍攝的越南民間信仰儀式、葬禮和佛教儀式等影片和照片，讓在場的日本研究者和綫上的越南研究的參加者通過視訊郵件，以及越南的研究者的郵件，憶述他們對末成教授在田野調查時的印象。

隨後，三位新一代的研究者發表他們的研究報告。以下，筆者簡單的按次序介紹這三位年輕學者的報告，從而瞭解末成教授的研究，如何在年輕一代傳承。

越南河內昇龍大學的鍋田尚子老師的報告題爲「末成道男教授的竈神研究與順化的竈神信仰」。報告以末成教授關於越南北部的竈神研究為基礎，把研究視野延伸到越南的中部。報告指出，同是竈神信仰，可是無論是方位觀念或風俗習慣，越南北部和中部的竈神信仰都存在差異。在三位演講者中，鍋田老師是唯一一位認識和接受過末成教授指點的研究者。

國家民族學博物館研究員康陽球老師發表的論文為「財物の利用・交換・継承を通じた母系親族の形成：ベトナム南中部山地のラグライ人の事例から」（〈財產的使用、交換和繼承與母系親屬關係的形成：以越南中南部山地的拉格萊人為例〉）論文。末成教授在台灣阿美族的研究中指出，在母系社會中「家」（ロマRoma）的重要性。[18] 康氏的報告指出拉格萊族與阿美族一樣，屬於南島語系，也是母系社會。和阿美族一樣，拉格萊族，强調以「家」為中心的雙系關係，「家」是生產和交換的主體，也是構成「外婚」的單位。

大阪大學研究院的趙浩衍先生的報告以「ベトナム家譜における世代表示タイプについての再考」（「重新思考越南家譜中的世代關係的類型」）為題，進一步拓展末成教授的越南家譜研究。[19] 末成教授曾經收集和分析河內漢喃研究院所保存的越南家譜。趙氏的報告在末成教授的研

究基礎上，進一步解明末成教授沒有充分討論的「以自我為中心型」和「以祖先為中心型」的家譜的歷史變化及與其相關的修譜意識的變化。

可以説，末成教授在越南人類學方面的成就，受到不直接認識他的年輕一代的研究者所注目和傳承。

九、結論

末成教授為日本的越南人類學研究奠定了基礎。筆者衷心銘記末成教授的偉大人格，感恩教授的教導，並祈禱他的靈魂安息。

十、致謝

筆者感謝橫山廣子教授的推介，以及蔡志祥老師的翻譯，讓這篇紀念末成道男教授的文章可以在《田野與文獻》的專號出現。筆者也感謝主辦日本越南研究者會議的加藤敦典會長、理事會以及各位會員的支持，讓我們在會議中組織紀念末成道男教授的專題小組。比留間洋一教授草擬了一份末成教授關於越南人類學的著作目錄，並且為這個專題小組擔任主持和評議。筆者感謝會議中發表關於末成教授在越南中部調查研究的新江利彥教授，發表關於末成教授在越南和中國調查研究的周春交教授，以及專題小組的三位發表者鍋田尚子先生、康陽球先生和趙浩衍先生，會議的協辦單位的「百越之会」的負責人瀨戶徐映里奈老師，以及在會議時對筆者提出意見和問題的風響社石井雅社長和公益財團法人東洋文庫的會谷佳光先生等深表謝意。

註釋：

1. 末成道男，《ベトナムの祖先祭祀――潮曲の社会生活》。東京：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1998 ，頁3；末成道男，《ベトナムの祖先祭祀潮曲の社会生活》。東京：風響社，1998，頁3。
2. 末成道男，《ベトナムの祖先祭祀――潮曲の社会生活》，頁4；末成道男，《ベトナムの祖先祭祀――潮曲の社会生活》，頁4。
3. 末成道男，〈ベトナム鏡を通して見た韓日の社会組織〉，頁275。伊藤亞人、韓景九編，《韓日社会組織の比較》。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2，頁275-309。
4. 末成道男，〈ベトナム鏡のおもしろさ〉，頁1。《比較民俗研究》，17号(2000)，頁1-2。
5. 末成道男，〈ベトナム鏡を通して見た韓日の社会組織〉，頁275-276。
6. 末成道男，〈ベトナム鏡を通して見た韓日の社会組織〉，頁304。
7. 末成道男編，《東アジアの現在――人類学的研究の試み》。東京：風響社，1997。
8. 末成道男編，《東アジアの現在――人類学的研究の試み》，頁1-2。
9. 末成道男，《ベトナムに関する日本文化人類学研究の総括と現地への発信》。平成14 - 平成17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B）（1））研究成果報告書。
10. 末成道男，《ベトナム文化人類学文献解題――日本からの視点》。東京：風響社，2009；末成道男，《ベトナム文化人類学文献解題――日本からの視点》。東京：東京外国語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2009。
11. 末成道男，〈創刊にあたって〉， 頁2。《ベトナムの社会と文化》，1号，1999，ベトナム社会文化研究会，頁1-3。
12. 板垣明美編；末成道男、武内房司、宮沢千尋、樫永真佐夫等著，《ヴェトナム――変化する医療と儀礼》。東京：春風社，2008。
13. 末成道男，《人類学から見たベトナム社会の基礎的研究――社会構造と社会変動の理論的研究》 平成6・7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総合研究A）研究成果報告書，1996。
14. 末成道男，〈ベトナムの人類学的研究〉，《東洋文化》，第78号(1996)。
15. 末成道男，〈創刊にあたって〉，頁1-2。《ベトナムの社会と文化》，1号，1999，ベトナム社会文化研究会，頁1-3。
16. 末成道男，〈創刊にあたって〉，頁3。 《ベトナムの社会と文化》，1号，1999，ベトナム

社会文化研究会，頁1-3。

17. 末成道男，〈ベトナム民族誌のマルチメディア的形態をさぐる——大森康宏教授「新しい視覚情報開発のための民族誌映画の分析と活用」プロジェクトに参加して〉。大森康宏編，《マルチメディアによる民族学》，国立民族学博物館調査報告，35號(2003)，頁31-35。

18. 末成道男，《台湾アミ族の社会組織と変化ムコ入り婚からヨメ入り婚へ》，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3。

19. 末成道男，〈ベトナムの「家譜」〉，《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27号，1995，頁1-42。

In memory of Michio Suenari sensei

Masahisa Segawa (瀬川昌久 Emeritus Professor, Tohoku University)
(Translated by ONG Chiew Hong)

For me, Suenari Michio sensei, was a great shisho (master) from whom I learn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methods. Although not directly my (dissertation) advisor, we were both students ("disciples") under Professor Nakane Chie (中根千枝). For my doctoral dissertation, we walked together to temples, ancestral halls and interviewed the people in Hongkong. In 1987, when we collaborated in research in mainland China, we walked together around villages in Chaozhou and Meixian in Guangdong province. It was for me, an opportune time to master fieldwork methodology from the expert field researcher himself, Suenari sensei.

Whether it is in Japanese or Chinese language, Suenari sensei is not talkative, but with his humble innocence, was able to lead his informants to open up to him, disclosing accurate information. That skill was probably honed from his many years of experience working in aboriginal or Chinese societies in Taiwanese, or villages in Korea and Japan. When he transited to research on Vietnam, his such skills are clearly attested in his excellent publication *Social life and Ancestors in a Vietnamese village on the outskirts of Hanoi* (《ベトナムの祖先祭祀：潮曲の社会生活》。東京：風響社，1998).

From our many meetings in Japan over the years and our joint field research in Hong Kong and China, I have learnt many things from Suenari sensei. Here, I wish to specially highlight two instances that have left an unforgettable impression on me.

At the end of a hot summer day of fieldwork in Chaozhou, Suenari sensei advised: "On a day like this, a hot shower will help take away the fatigue." Just a casual remark at the end of dinner in our lodging, this glimpse of the warmth of his humanity has remained in my memory. On another occasion, at the evening drinking party at the end of a seminar in Tokyo, he uttered "Those who practise goo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daily life in their native land will similarly succeed in field work in foreign lands." This reminder of our responsibilities as a social being, not just to a researcher, is another snippet from Suenari sensei which I will never forget.

I wish to deeply thank Suenari sensei, my teacher of life. I am sad at his passing.